

子进行活动，与恒升、李二全、豆豆、善清、卜子嘉、王久旺等十多位蒙族同胞交了朋友，这些蒙古族同志都为革命作了不少贡献。

“老一团”这支由蒙古族同胞组成的地方武装，当时几乎成了我党地下工作同志随便出入的地方。特委的同志们如遇紧急情况，穿起“老一团”士兵的服装，即可隐蔽下来；特委同志到外地工作，开个“老一团”的证照，既不用花钱买火车票，又安全稳妥。由于特委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视蒙古族同胞为朋友，所以这支蒙古族部队的不少官兵，均帮助特委做了不少工作。

为了揭露民族上层分子投靠国民党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，1934年初，梁一鸣同志用“内蒙古人民自治同盟”的名义，起草《告蒙古人民书》，来阐明我党的民族政策。梁一鸣亲自赴北平向党中央代表孔原同志汇报了绥远特委的工作，递交了《告蒙古人民书》。两天后，梁一鸣接到通知说：“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，你可速返包，准备迎接新的任务”。

三、中共绥远特委的转移

1934年底到1935年夏，包头地区的

白色恐怖日趋严重，恰在这时，北平的党组织遭受破坏，绥远特委与上级的关系突然中断，开展活动非常困难，特委的同志们均被迫先后转移。

随着形势的恶化，鲁贲、安建平夫妇转移，梁一鸣回到北平，刘仁和吉合搬到了乡下。

1935年夏的一天，刘仁、吉合进城活动，来到“老一团”排长王久旺家里。突然，一位中年妇女闯进来，急促地说：“胡排长请你们过去坐一坐。”

原来是街头出现了宣传抗日的标语和传单，侦缉队跟踪追寻，发现了刘仁和吉合的行踪，正在准备下手逮捕他们。“老一团”的排长胡锁锁得到这消息后，马上赶回家，叫妻子去通知特委的同志。

刘仁和吉合一进胡家的门，胡锁锁就说：“今天十二点，侦缉队就要来抓你们，现在是十点钟，我去护送你们赶紧出城！”吉合感激地说：“胡排长，有两个钟头的时间，我们完全可以撤出城去，我们告辞了！”说完，两人拔腿便走。就在他们撤出来半小时之后，敌人的侦缉队包围了王久旺的院子，但却扑了个空。

面对越来越恶化的形势，为了保存力量，刘仁和吉合共同研究决定，绥远特委撤离包头，并写信通知新任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速到包头。